

XINSHIJI DICENGWENXUE XIANXIANG YANJIU

新世纪

“底层文学现象”研究

潘 磊 | 著



人民出版社

新世纪 “底层文学现象”研究

潘 磊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怡石

版式设计：杜维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底层文学现象”研究 / 潘磊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 - 7 - 01 - 017848 - 6

I. ①新… II. ①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4402 号

新世纪“底层文学现象”研究

XINSHIJI DICENGWENXUEXIANXIANG YANJIU

潘磊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5

字数: 22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7848 - 6 定价: 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作者简介

潘磊，女，河南平顶山人，九三学社社员。1995 年至 2002 年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获得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2005 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学位，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延安文学、新世纪文学、河南文学。在《鲁迅研究月刊》、《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报刊上发表四十余篇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鲁迅”在延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责任编辑 > 王怡石
封面设计 > 周方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底层”的浮现与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发轫	12
第一节 “底层”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13
第二节 “底层”概念的使用与底层文学思潮的萌发	23
第三节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底层形象的演变	33
第二章 底层小说中的城乡叙事	46
第一节 热爱与仇视的纠缠：底层小说的都市想象	46
第二节 底层小说对都市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59
第三节 温情与厌弃的悖论：底层小说的乡土叙事	67
第四节 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候鸟”：底层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困惑	80
第三章 底层小说中的女性叙事	90
第一节 类型化的“都市传奇”：进城少女叙事的“奇观化”	90
第二节 平实的“生活流”：底层中年女性叙事的“日常化”	100
第三节 苦难的极致书写：下岗女工叙事的“单一化”	108

第四章 影视剧中的底层影像	118
第一节 形态多元的“民工剧”	118
第二节 贾樟柯电影的底层世界	135
第三节 底层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	145
第五章 底层的自我表述：“打工诗歌”的意义世界	158
第一节 打工诗人：拒绝被同化的抒情主体	159
第二节 单调的工业流水线与强烈的社会剥夺感	166
第三节 怀乡：底层精神家园的失落与构建	184
第六章 新世纪底层文学缺憾的审视与反思	200
第一节 绝望的苦难叙事与无力的温情叙事	201
第二节 作家的创作立场与创作困境	209
第三节 “底层文学”何为？	219
参考文献	226
后记	229

引 论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局性整体推进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不仅经济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国力进一步增强，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同时，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也开始全面提速。

但是，在快速发展中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化。在社会学家看来，定型化的标志^①在于四个方面：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突出的标志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同时，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文化的差异也强化着社会分层；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沦为社会底层的群体产生了相对剥夺感；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缺少资本的社会底层向上流动变得非常困难；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阶级阶层的开放性。阶级阶层只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位置，而不是一种固定的社会身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是相对稳定的，而个人的社会身份是流动的、易变的。但目前，底层社会与整个

^① 此处的分析参见孙立平：《利益关系形成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2008年第3期。

社会结构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的。

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结构变动，“底层”开始浮现出来，进入人们的视野，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一时之间，“底层”成为一个流行的学术词汇。在底层研究方面，社会学无疑走在了前沿。无论是陆学艺、朱光磊等人的社会分层研究，还是李培林、孙立平的社会结构研究，都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学的研究中，笔者比较赞同孙立平对于底层社会的观点。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的底层社会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构成^①：一是贫困的农民。以城市为轴心的现代化使得农村愈加边缘化，当下，乡土所能提供的资源变得非常有限。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距离城市较近的不少农村正在实现城市化，而西部、北部等偏远地区的农民仍然没有解决温饱。即便是那些正在迈向城镇化的乡村，农民收入相对较高，但医疗与子女教育也是困扰他们的重要问题。二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农民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产生的新的社会群体。目前，农民工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农民工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得到了城市的认可，是一种合法性的存在，他们多在建筑工地、纺织厂、家政保洁公司打工，有一定的保障。还有不少进城的农民生活在暗区，比如拾垃圾的、漂泊不定的杂工还有沦为小姐的乡下女性，但他们并没有如农民工群体受到那么多的关注与社会服务。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进入城市的农民无法被城市接纳，成为城市市民。他们虽然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但在制度上他们还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在城市，他们的基本权利常常受到损害，工作环境差，工资待遇低，基本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工资常常被拖欠。三是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90年代以来，我国失业下岗的问题日益严重。社会学学者李培林在文章中指出，从1996—2001年，中国累计的下岗职工有2500多万人^②。在城

① 参见孙立平：《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

② 参见李培林、张翼：《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市，失去职业就意味着基本生活来源的断绝。目前，物价和生活费用急剧上涨，对于下岗工人来说，基本生活难以保障。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需要大宗开支的项目都是下岗工人无法解决的实际难题。由于下岗工人大都在35—45岁之间，正值青壮年，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下岗之后，全家陷入贫困。

在“底层”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的焦点之际，文学艺术界也对底层问题做出了快速的回应：贾平凹、刘震云等知名作家不断涉猎底层题材，陈应松、罗伟章、王祥夫、刘继明、曹征路、胡学文等青年作家则因其底层写作而迅速崛起于当代文坛。2004年是底层文学最为高产的时期。这一年，就有不少以底层为题材的小说面世：《农民刘兰香之死》（向本贵）、《麻钱》（宋剑挺）、《那儿》（曹征路）、《马嘶岭血案》（陈应松）、《找啊找》（王祥夫）、《紫蔷薇影楼》（乔叶）。从2004年起，底层文学逐渐成为文艺界关注的中心，底层文学持续升温，作家纷纷跟进，最终汇成了一股底层文学思潮。除了知识者对底层的观照与书写，还有在珠三角一带流水线工厂中的打工者，以诗歌的形式书写着他们的艰辛与苦涩、梦想与憧憬。打工诗歌经过二十余年的沉淀、积累，产生了郑小琼、谢湘南、张守刚等影响力较大的诗人，他们的诗作逐渐引起主流诗坛的关注。打工诗歌的质朴、原生态给以知识者为主的底层文学创作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应当说，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已经逐渐成为新世纪文学生态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在电影界，伴随着新纪录运动的展开以及第六代导演的转型，也出现了一些反映底层群体生活现状的影片，如贾樟柯的《小武》、《世界》、《三峡好人》，范立欣的《归途列车》等。在电视剧领域，管虎的《生存之民工》、张纪中的《民工》都获得了不错的口碑。这些影视作品以纪实的手法忠实地记录底层小人物在大时代冲撞下生存的尴尬与疼痛，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从而让底层小人物获得生存的尊严，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总而言之，对底层的关注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现象，成为一种文艺思潮。

与文艺界对底层的关注和表现形成对比的是声势浩大的对底层文学

的讨论。有研究者指出，底层文学创作尽管泥沙俱下，庞杂不齐，但对底层文学的讨论却是日益深入和精彩^①，确是中肯之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种讨论起始于对当下底层文学创作本身的探讨和批评，但很快就超越了具体创作，成为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界既有理论资源与发展趋势的探讨与反思，指向对新时期文学及新世纪文学内在发展理路的全面探讨和反思。因此，有关底层文学的研究一直带有超前性的特点。这种超前性，主要体现在研究者并不仅仅拘泥于具体的创作实际，而是更多地借助于他们的社会观察、理性思考以及文化分析，突出地强调了这一写作思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是说，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底层写作”所透射出来的社会学或文化学价值，将它们作为阐释自己思考的有效证据，而不是简单地服膺于文本自身的审美特质，进行单纯的文学评述^②。评论家王尧也认为，“关于‘底层写作’论述的话语张力则大于‘底层写作’本身。”^③对这场规模宏大的底层文学讨论^④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与把握，显然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只能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和影响较大的论点进行一番梳理与辨析，以求对当下的底层文学研究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

在底层文学讨论中，研究者常常援引相异的理论资源，展开对底层文学创作的批评和分析。丁帆将底层书写纳入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范畴进行剖析，认为城市异乡者的书写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表现阈限和内涵，此前的乡土小说多是以乡下“本土”上发生的故事为“本事”，或以浪漫的姿态表达对乡土的眷恋，或站在启蒙的立场强调对乡土愚暗的批判，而当下以进城农民为书写对象的作品，注重的是对投身于城市角落的乡下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空间的揭示。这些作品对城市文明与农耕

① 白浩：《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② 洪治纲：《“底层写作”的来路与归途——对一种文学研究现象的盘点与思考》，《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

③ 王尧：《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

④ 截至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知网上按题名输入“底层”，在“中国文学”这一类别中已有研究文章708篇。

文明矛盾冲突的揭示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嬗变为现代中国的艰难历程，也描画了乡土文学转型的轨迹。丁帆认为，作家应当带着较强的文化批判意识来进行底层文学创作：“我们的作家仅仅站在感性的人性和人道的价值立场上，自上而下地去同情和怜悯农民工群体是远远不够的，还缺乏那种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那种欧洲 18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清晰的理性批判眼光和锋芒。更重要的还是需要乡土小说作家们在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交战中，用历史的、辩证的理性思考去观察一切人和事，才不至于陷入文化悖论的两难选择的怪圈之中不能自拔。”^①丁帆的观点直击当下底层文学创作的弊端，对作家的文化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徐德明则深入到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提出了“城乡意识形态”的概念：“城乡意识形态”是乡下人进城后遭遇的文化障碍，影响到了作家在叙述中的经验传达和文学的想象方式。在城乡意识形态层面关注乡下人进城，本应该“聚焦乡下人生存的反思”，“聚焦于乡下人与中国 / 世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重新考虑农业中国与现代性的复杂互动”。遗憾的是，“大多数小说没有顾得上对作为背景的现代性进行深入反思，也不大见到对城乡意识形态的体认与批判。”^②李云雷、邵燕君、曹征路、旷新年等人认为底层文学接续了中国的左翼文学传统，是新左翼文学，是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是文学的政治诗学的回归和重建。他们认为底层文学应当从中国的左翼文学传统中汲取资源，充实自身，“‘左翼文学’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经验，比如民族形式的追求、‘大众化’的追求、直面现实的精神，等等，这在我们关注‘底层’时仍是值得借鉴的。”此外，“‘左翼文学’拥有颇为丰富的理论建树，鲁迅、瞿秋白、毛泽东、郭沫若、茅盾、胡风、周扬、冯雪峰、丁玲等，都提出了新的命题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们的论述不仅为‘底层文学’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而且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

^① 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文学评论》2005 年第 4 期。

^②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文艺争鸣》2007 年第 6 期。

程，也为‘底层文学’如何容纳、吸收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思潮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①中国左翼文学在融入民众生活、生动活泼的大众口语等方面可资借鉴，但将底层文学与左翼文学简单对接，既忽视了它们各自产生的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也对中国的左翼文学传统缺乏历史性反思。蔡翔、单正平、张清华等人侧重于从知识分子的伦理使命与人文精神展开分析，张清华指出：“我不否认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写作者而言他的动机的无意识和含混性，甚至他的思考和观察角度的某些‘不健康’趣味等，但正是这些作品强化了我们时代的一个关于写作伦理的庄严命题。”“所以，我们并不能去苛求写作者，对他们的写作动机提出虚妄的质疑。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认为这是拯救我们时代的良心和每一个个体的人性的有效途径，因为悲剧的意义正在于对局外人——那些观众的良知与心灵的唤醒和救赎。”^②知识分子只有实现如莫言所说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它们，并且倾听到他们的心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只有实践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诺言，才有可能达“现实主义”的真实。因此，替民代言和为民立言的讨论，已经脱离具体的底层本身及底层文学文本本身，直指知识分子立场如何建构的理论探讨。

洪治纲和牛学智贴近底层文学文本，提出了其叙事上存在的问题：苦难泛滥的“苦难焦虑症”与回避矛盾的温情叙事。洪治纲在《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一文中指出：“‘女底层’往往是直奔卖身现场，或明或暗地操起皮肉生涯；‘男底层’呢，通常是杀人越货，既恶且毒，一个个瞪着‘仇富’的眼神”，这反映出作家的懒惰，“紧紧地拥抱着那些公众传媒中不断报道的故事，在经验和常识中‘关怀’着底层，将底层生活弄得没有道德羞耻，不见亲情伦理，甚至是为所欲为”，苦难的放纵书写带来的阅读感受是“惊悚、绝望、凄迷和无奈，间或还有些堕落

① 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② 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式的快慰和暴力化的戏谑”，而这正是消费文学阅读的典型体验。牛学智认为底层文学中的温情叙事总体上是乏力的，过分沉溺于日常生活的小叙事或民俗的静态描写，将底层作为美学上的一个载体，忽视当下突出的社会问题，无疑会失去了底层文学的写作意义，值得警惕的是，当下的底层文学已经从苦难叙事转向了“和谐美学”与“幸福美学”^①。可以说，苦难焦虑症、温情浪漫叙事指向的是消费主义的媚俗消费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正确症。其后，针对底层写作出现的种种弊病，研究者开始犀利地指出其批判现实的不力和思想性的匮乏，其中甚至不乏激烈的酷评。陈晓明在分析底层写作的艺术倾向时，指出：“这些小说在‘人民性’与美学表现之间建立起奇异的依赖关系。但‘人民性’的表达并不能在思想意识方面深化下去，而变成一种美学表现策略。在小说叙事中，运用突然转折的情节和技巧，寻求从表达‘苦难’压抑性的结构中逃脱的途径，形成当下小说艺术表现的审美脱身术，并形成小说特有的艺术效果。”^②在陈晓明看来，底层小说的审美脱身术是作家无力直面现实的一种表现。还有研究者中肯地指出：“（底层小说）除了将底层塑造成值得关怀和同情的弱势群体之外就别无他法。作品往往将虚妄和无奈像梦魇一般久久压在读者心头，作者都在潮涌般地呈现底层的艰难，却没有承担起对底层精神上苦难的更进一步的挖掘。”“在底层的写作中，对人的关注与表达裂变为深层的人性关怀与表层的生存关怀两重，但往往又将重心向后者滑落。作家偏重于写底层的恐惧、屈辱、困惑、颓唐、挣扎和绝望，而没有去挖掘他们生活中乐观的一面。”^③客观地说，这些评论的确指出了底层写作存在的病症，需要作家正视。还有研究者指出，当底层文学成为新一轮的主流话语，就以惊人的速度复制，“底层写作作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文学色彩的冲击已经成为当今文坛普遍的文学现象甚至衍生为一场语言的盛宴与狂欢，这成为各个阶层

① 牛学智：《“底层叙事”为何转向浪漫主义》，《读书》2009年第2期。

② 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③ 刘巍：《新世纪文学底层写作的精神缺失》，《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的文学机构扶持作家的重点考察范围。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写作目的的不纯粹性，为了迎合主流的审美趋向而说着空泛的假话和套话，在一定程度上底层、乡土在他们的文学中只是赢得某种利益的手段，疼痛和苦难成了换取荣誉的工具。”^①这种评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未免绝对。在讨论中，对底层文学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比如“题材决定论”、“强占道德制高点”等。评论家王尧忧虑对底层文学的强调会落入“十七年文学”题材决定论的窠臼，“用是否写‘底层’判断作家的现实主义精神，用是否关心‘底层’确认作家的道德观，用写什么样的‘底层’论定作家的成就，甚至用‘底层’作为核心概念来批评文学思潮阐释文本等，都反映了‘底层写作’论述中‘题材决定论’倾向。”^②王尧的批评包含了对中国左翼文学传统的深刻反思。其实，这些质疑和批评都对作家提出了要求，对底层文学的艺术性提出了要求，促使作家超越对底层生存表象的关注，深入到底层的精神世界，从而创作出具有丰厚精神意蕴和良好审美特质的精品佳作。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脱离了当下的底层文学创作本身，从文化视角来探讨底层问题，这类研究以南帆和他的学生为代表。南帆等人着重分析底层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以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南帆受到印度学者的影响，专注于底层经验的表述问题，他在《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中指出，底层无法自我表述，又听不懂知识分子对底层经验的展示，因此，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南帆的学生滕翠钦的博士论文《被忽略的繁复——当下“底层文学”讨论的文化研究》撇开具体的底层写作，致力于对底层的文化研究。论文探讨的是底层文学与现实主义、纯文学、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底层的“物质想象”与底层的“日常特性”，拓展了底层文学讨论的视阈，理论色彩浓厚。刘桂

^① 霍俊明：《尚未抵达思想前沿的“征用”写作——就“底层”和“新农村”谈新世纪文学思想性问题》，《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

^② 王尧：《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

茹的《底层：消费社会的另类符码》、季亚娅的《底层叙事：言说的理路与歧途》等认为在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底层”成为消费的对象，“底层”经历着被大众文化收编、改写的被动命运。由于这些文章大都理论探索色彩浓厚、晦涩难懂，因此引起了对于学院黑话症、抢夺知识话语权、理论自娱症的尖锐指责。另外，华东师范大学刘旭的专著《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梳理了 20 世纪文学对于底层的表述，底层形象的变迁，还审视了诸如张贤亮、高晓声等当代作家身上不自觉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影响到了他们对于底层的认识与塑造。这部著作体系严整，以底层这一新的批评视角来审视 20 世纪文学，省思作家的精英意识或精英主义，虽没有介入当下的底层文学创作，但对当下的底层写作有着启发性的意义。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底层文学的讨论其实已经成为文学界的知识分子建立起的一个公共领域，通过这一公共性话题，文学重新开始与现实对接。追溯起来，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调整过程。“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离政治太近，甚至成为政策的传声筒。“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文学开始了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寻找独属于自身的话题的漫长历程。但与此同时，文学也渐渐远离公众视线，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在内容上的离奇荒诞与形式上的晦涩难懂更使文学脱离现实、远离读者。进入 90 年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文学更加边缘化，对时代的中心话题很少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尽管有人文精神大讨论、“现实主义冲击波”、个人化写作等现象或思潮的讨论，但这些讨论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学者们也没有以明确的介入性姿态，针对文学与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而底层文学的讨论一开始就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现实，研究者大都从社会学研究中汲取思想资源，对现实社会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而且随着各种现代文化理论的不断运用，研究在整体上具有极为突出的干预现实的倾向，对作家的创作实践有着明确的指引作用，折射出了研究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在急剧的社会分化中，对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强烈呼吁，展示出了现代知识

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底层文学讨论的意义非凡，“它指向对于新世纪文学发展方向的争鸣与探索，展现出对新世纪知识分子伦理之魂的重铸行动。至此，理论界的探索获得了独立于底层文学创作及依附性批评之外的超越性价值。”^①

尽管底层文学的讨论具有重大的意义，是继1993年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之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唯一能够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论争^②，牵涉到文学与现实、文学对正在发生的社会分化和改革过程中利益分配的态度、作家的良知、文学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究竟充当何种角色等重大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场争论也存在着缺憾。由于理论资源的多元，研究者一直沉溺于各自的理论脉络之中，缺乏对底层文学文本的细致观照。一言以蔽之，就是理论阐释过度，文本分析薄弱，对此，洪治纲指出：“尽管一些研究者也曾对一些具体的创作文本进行了必要的分析，但绝大多数都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层面的论述，或者说是一种主题学评述，其目的还是为了印证各自的理论性思考。像孟繁华、李云雷、贺绍俊、邵燕君、王光明、吴思敬等人的很多评述，都是停留在文本的主题思想层面上，对其中的形式问题只是简略而谈，很难见到颇为精深的文本解析。特别是对于‘底层写作’中普遍存在的艺术问题，不少人都是以‘概念化、模式化、道德化’等进行笼统评价，并没有对这些文本的内在不足进行深入的艺术分析。”^③

针对底层文学研究的这一缺陷，笔者意欲系统考察新世纪的底层文学创作思潮，力图以底层文学文本为基础，立足于文学研究，结合社会学、文化研究等方法，力图对底层文学这一文学现象做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从而把握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全貌。不过，由于底层文学作品数量巨大，良莠不齐，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选择影响较大的和有代表性的

① 白浩：《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② 孟繁华：《“到城里去”和“底层写作”》，《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③ 洪治纲：《“底层写作”的来路与归途——对一种文学研究现象的盘点与思考》，《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